



生命倫理學的挑戰

“由於新生兒和魚兒都不是一個人，殺這些生物並不像殺人那麼不道德。”Peter Singer，普林斯頓大學倫理學教授。

“我覺得你們應該盡力去改善人類的生命，我不覺得遺傳學是冒犯神靈，因為我不相信世上有神。”James Watson, DNA的共同發現者。

“基督徒權益份子以宗教名義錯誤地去限制幹細胞研究，等同於中世紀時因為伽利略的科學見解與教會的教義有矛盾而制裁他。”Newsweek新聞週刊。

這些出位的言論有甚麼共通點？它們都是與近年來受到各界關注的、以生命與死亡為主題的「生命倫理學」規範有關。這些言論似乎令人震驚，但它們都是出於現代社會上具影響力的意見人士。不幸地，大部份天主教徒都不察覺這場維持了40年的重要文化爭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稱這為「死亡文化」與「生命文化」的角力。

生命倫理問題：冰山一角

生命倫理學始於1960年代，當時醫學科技日跨千里。醫生、律師、政客及宗教領袖都要處理隨之而起的爭議。墮胎、避孕、安樂死及體外受精等議題的爭論，直至現今未有減少。

隨後的幾十年，醫學發展得更快，帶來了前所未見而又複雜的困境。每天，新聞傳媒報導複製繁殖、幹細胞、基因操縱及其他劃時代的突破發展。地球上的每一個大洲都傳出有關RU486墮胎藥、事後避孕丸、用避孕套預防愛滋、判斷腦死亡的準則、及售賣身體器官等的爭論。同一時間，很多立法機關需要為同性婚姻、保護環境、及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等作出決定。

擺在目前，最尖端的科技帶領著一連串從未有過的隱憂：創造雜交混種以至怪物、在胚胎植入前用基因診斷選擇優生的胚胎、專門設計的嬰兒、輕易瞞過肉眼的納米技術、神經系統科學、再生醫術及回春術、或者是把人腦與電腦交匯轉碼。這些新創意似乎沒有盡頭。道德標準能否趕上這些新事物的速度？

時常這些話題都會牽涉上政治層面。國家及國際組織已設立了法律、指引及政策去確定這些新科技的使用範圍及界限。可惜，由於它們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响是那麼大，這些新科技時常操控在跨國的經濟利益集團及其他財雄勢大的投資家手中。這時常使道德標準難於執行。所以，不受金錢利益及政治關係影響的、中立的、客觀的聲音是目前比任何時刻更需要的。

從表面來看，似乎今日人類面對著一系列無止境的生命倫理問題。每個帶來一些好處的新科學突破無可避免地也會帶來一些道德上進退維谷的局面。這是一把雙面劍。其實，我們談及的生命倫理挑戰只不過是冰山的一角。

相信我們都見過冰山的圖片。那露出水面的部份，那冰山的尖端，是整個冰山的十份之一而已。同樣，生命倫理的問題是比表面看來更深遠。當科學再推向前，新的問題便會繼續浮現。然而，這些問題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思想的戰爭

那些我們不常從傳媒聽到的深層問題——那個我們看不見的十份之九的冰山——是我們需要去分析的。這些問題涉及人類的天性及尊嚴、人人追求的共同的美善、人類的生死存亡、以及痛苦與死亡的意義。換言之，這些是關乎人類命運極度深遠的問題，亦是最終極的宗教問題。

作者：譚傑志神父
翻譯：麥淑儀女士

在它悠久的哲學及神學傳統，天主教會都曾對這些問題提出有根據的反應。可是，正如在文章開端引述的言論可見，今天有很多對這些反應的嚴重挑戰。這次思想戰爭的分歧是甚麼？本人在這刻見到與生命倫理相關的五個挑戰。

1) 科學實證主義

自啟蒙時代以來，人們便維持著“科學肯定對人類有進步及利益”的想法。若是如此，便不應該對任何的科學研究作出限制，尤其是在道德倫理上或宗教上的界限。有些人士稱之為“科技的無限權威”，即一定要不惜任何代價讓科學及科技向前推進。這便是兩年前英國政府准許製造人獸雜種試驗的理據。另一例子是美國奧巴馬總統最近的決定——批准政府基金去研究胚胎幹細胞，雖然現在已有其他可以代替的方法。科學實證主義是一種過份樂觀的理想意識，以為科學力量能醫治所有的疾病。但其實，科學可能是美好的，亦可能是邪惡的，正如原子弹的發明可見一斑。科學不應是盲目的；它的方向定位應該是由人類以完善，健全的道德制訂的。

2) 人類天性的技能與操控

今日科學世界觀是那麼的盛行，我們通常會以物質來衡量事物。我們險些會把人類看成一堆細胞、組織和器官。科技使我們能操縱大自然，讓我們可以生活得舒適和健康——例如飛機、互聯網、醫藥等。然而，當生命科技更進步，我們可以改造自己、我們的本性——活得更長壽、有更大的記憶或更高的智商，增強我們的基因組合或體格能力，及去為下一代選擇優等特性。這些可能性是從未有過先例的：改造人類，我們亦會改造我們的人性。但是，誰能決定甚麼是真正的人性呢？當我們嘗試憑我們的幻想去塑造人類，我們不是在扮演神的角色嗎？如果我們只是著力去改善我們的體能或智能的特性，我們的靈性方

面——去愛、去夢想的能力——會否被忽略而顯得更貧乏？在關鍵時刻，我們能保持高尚的情操或甚至願意英勇地犧牲性命嗎？

3) 功利主義

在一個消費者的社會，金錢及經濟利益很容易戰勝道德的顧慮。功利主義的理論是能達到最好的後果——即是能使大多數人得到最多的好處——便是合乎道德的做法。所以，如果我們去殺死一個人而能夠救回一百人的性命，那麼這行動便被認為是合理的。由此論證引申，殺死那些體外受精剩餘下來的胚胎而將它們用來做研究是合乎道德的，因為這些研究可能為很多病人找到治療的方法。根據這理由，我們亦應該容許由昏迷不醒的人、持久的植物人、無腦畸形兒、甚至在等待行刑的死囚身上取下器官。這套邏輯在一些醫院內已是普遍盛行著，他們違背家人的意願，拒絕治療那些他們認為是“無希望的護理”，理由是因為病人太老、太弱或生活質素很差。他們認為讓病人死去不是好過延續他們“悽慘的存在”及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嗎？

4) 道德相對主義

我們生活在全球化的世界。人們時常與不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這種多元主義或多文化主義被強調奪地演繹為道德相對主義。它是說由於每一個文化有其不同的好與壞的概念，所以便沒有絕對的道德生命標準。因此，道德的決定是可以因應每個人的背景，成長及文化而調整的，而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對錯觀念強加於他人身上。在多元及國際大都會社會，法律一定要盡量減少以維護和諧及促進差異的容忍度。自由被提升為至高無上的，人人都應該可以選擇去做自己喜歡的事（例如要求墮胎）。這種想法相反於天主教所確認的“在多元文化中有一共同的人性道德存在”的教導。這一共同本性讓每個人找到那條寫在他的良心深處的法律：行善避惡。

5) 俗世化

在過去，宗教在決定道德行為上擔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宗教被認為是引起不和及經常引起激烈的矛盾，所以教會與國

家分家是必須的。因此，曾經有積極的運動去邊緣化及毀謗教會維護道德的聲音。上面最後一段引述的言論，便是以現代普遍認同的科學實證主義心態來描繪成基督徒的反科學觀。不幸地，甚至一些天主教的教育機構及大學都受了這些世俗主義的影響。他們很多都已洗脫了他們的天主教徒身份，亦沒有了那份智慧活力去捍衛教會的教導。事實上，生命倫理的世俗化取向在天主教大學已是如公開大學般普遍。

「死亡文化」與「生命文化」

學術上的生命倫理現在是九成世俗化。它是與教會認同的人類有共同的本性及有內在的尊嚴完全相反。它繞個彎拒絕跟隨過去的傳統，包括醫生們在醫學院畢業典禮時不再跟隨傳統以希波克拉底誓詞（Hippocratic Oath）宣誓。浸淫在道德相對主義及功利主義中，世俗化的生命倫理能夠把任何東西辯證為合乎道德，甚至如 Peter Singer 所推崇的最兇殘的殺嬰手段。

這位從1999年以來在普林斯頓大學已教過多屆學生的澳洲籍教授，是很認真地鼓吹當父母們不要他們的嬰兒時，便可把那些嬰兒殺死。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書去辯護這是實行墮胎的自然的發展。他的觀點是具影響力的。除了在一所有名望的大學內任教，他已寫了十多本其他書籍及賣出了超過五十萬本。令人恐慌的是並非他獨有這種想法，在哈佛、耶魯、牛津及其他長春藤聯盟大學中任教的，有一很長的名單的“道德學家”都有同等殺嬰的想法。

我們只是見到冰山的一角。如果這些想法——在水底的那大團冰塊——浮現出來，人類的未來將會見到更多、更隱伏危險的建議。

僥倖地，很多人都已發覺這些世俗化的想法是一條死路，不再足夠處理今日的道德需要。有些人現正在重新評估宗教在道德上的位置。鑑於教會已有十多世紀的經驗去處理痛苦與疾病、死亡與永生的奧秘，這寶貴的智慧是不容忽視的。教會是以其先知的角色呼籲反對不公平、維護每一個人的尊嚴及權利，不管他們的種族、背景、身體狀況及年齡，由受孕的胚胎至自然死亡。教會能夠不受經濟或政治利益的包袱影響，履行世界上那些不屬任何黨派，中立的聲音。



譚傑志神父 LC, MD, PhD
意大利羅馬宗座宗徒之後大學
生命倫理學院助理教授

基督徒們也能以他們的祈禱及服務，在這場角力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服務那最弱小的、最貧窮的、及最被社會忽視的一群——殘廢的、有缺陷的、被遺棄的，不幸的婦女、吸菸者、孤兒、老人及垂死的人，是每個人類中的一員都有的、與生俱來的尊嚴的有力認證。

作為天主教徒更有捍衛生命的特別使命，他們應學習及傳播教會在這些事上的教導。在俗的教徒，尤其是醫護人員、律師、政治家及科學家，應該時刻留意教會發表的各項有關生命課題的通告。相比任何時期，現在更有需要更新天主教會的教育，去重新強調這些人類持久不變的真理。天主教的智識份子必須站起來，參與和世俗主義者的公開辯論、出版及會議。

人類面對這麼巨大的問題，我們不能再無動於衷，坐視不理。這便是若望保祿二世呼籲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去創造「生命文化」。

